

拜登的对华战略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九期

“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罗轻舟。

本期导言：时隔一年多，我们三人小组在挣扎中暂时复活了。本期选取外交政策网站的两篇文章以窥拜登之对华战略。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2020. 11. 11



经译求经

目 录

- | | |
|----------------------|------|
| 1. 拜登在亚洲地区的可信度相当成问题 | 1-6 |
| 2. 拜登现在是对华鹰派——有限度的鹰派 | 7-12 |

拜登在亚洲地区的可信度相当成问题

James Crabtree 著

罗轻舟 译

美国的盟友已经适应了特朗普以及他对中国的强硬策略，并对可能出现的拜登胜选一事感到忧虑。

Bilahari Kausikan 是新加坡前任高层外交官，以敢言著称。但是他最近对苏珊·赖斯的评论比平常更加直言不讳，赖斯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今年八月，当媒体报道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考虑将赖斯纳入竞选团队时，Kausikan 在脸书写到，“赖斯的任职将会是一场灾难”。赖斯可能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候选人，Kausikan 称赖斯应对北京当局方面意志软弱。“赖斯是那种认为美国为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得到中国的配合而应当淡化中美竞争的人”，而这种想法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根本的误解。Kausikan 预言如果拜登胜选，“我们将会带着怀旧情绪追忆特朗普政府”。

如果说 Kausikan 的尖锐观点通常使他在亚洲知识界显得格格不入，这一次显然不同。某种程度上华盛顿的许多人将会感到大吃一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们暗中在为拜登可能胜选感到忧虑，特别是重要的伙伴如日本和印度感到更加忧虑。在美国，特朗普对左派和右派双方的两面出击使他显得莽撞无礼，大家对他的政策失去信心。美国人也认为头脑正常的外国人同样会这样看待特朗普，也许这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但是在亚洲的多数

地区情况不太一样。东京、台北、新德里、新加坡和别的亚洲首都的官方相当程度上逐渐适应了特朗普，并乐见其对中国的强硬策略。相比之下，拜登任职总统的前景带回了奥巴马时期的不快记忆，许多亚洲的掌权者回想起当时美国对北京当局没有章法并且软弱无力。这种记忆的内容是否正确姑且按下不表。拜登在亚洲的可信度成问题，这一问题也许不好解决。

在民主党大会上的发言中，拜登勾勒出了他当选后的四个优先议题，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种族平等等。应对中国，这一亚洲外交政策高层的重要关切，并未出现在拜登的四个优先议题中。拜登的这种遗漏受到了东京当局关注，例如，日本对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很好地概述在了四月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该文名为《对抗中国之战略的优点》，由匿名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所作，文章批评奥巴马时期的对中政策的“优先任务一直是与中国啮合（engage，国内常译为接触）”，而非与中国竞争。此文作者指出，特朗普的政策不尽完美，但是他对北京当局更加坚定的策略受人欢迎。这名日本外交官问到，“如果可能，我们想要真正地回到特朗普前的世界去？”。“对日本的许多决策者而言，答案也许是不，因为一个基本正确而执行不良的战略[在特朗普任内]好过执行良好但是含混不清的战略[在奥巴马任内]。”。

公允地说，这篇匿名文章代表的只是东京当局的见解之一。但是此文的公布几乎肯定需要官方的外务省正式批准，这显示了此文表达了许多高层官员的看法。并且该文的观点与我自己最近

于 2019 年末到访日本时听到的声音是一致的，访日期间日方的高级官员和外交事务分析人士看上去对特朗普的下一任期将会意味着什么充满期待。相较而言，拜登的胜选会有回归到之前的对华策略之风险，该对华策略被许多人视为缺乏政治意志以应对和遏制中国当局。

同样的思路潜伏在新德里的表层之下。理智的印度外交部长 Subrahmanyam Jaishankar 去年的讲话反驳了那些认为特朗普伤害了美印关系的人。他讲到，“过去的两三年里，我在特朗普那里看到的这一切，与传统的美国体制完全不同”，“在一系列领域人们实际上取得了很大而明显的关键性进展”。随着印度费力应对迅速恶化了的印中关系，新德里当局逐渐很有可能珍视特朗普混乱但是有力抗衡中国之政策。最近评论员 Raja Mohan 评论到，至少拜登胜选可能会使印度的战略立场复杂化。他预计拜登会更少与中国对抗，同时拜登会终结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宽宏策略。他写到，“拜登治下美俄关系出现新压力和中美和解无疑会使印度的大国关系复杂化”。

相同之担忧也出现在台湾，台湾的外交官员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化保持着可以理解之敏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Alex Azar 近期访台一事凸显了双边关系的加强。Global Taiwan Institute 是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组织，Chieh-yeh 是该机构副主席，他说，“台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获益良多”。他表示台湾的许多人会支持“现有的政策多过未经检验的竞选承诺”。

拜登竞选团队不会同意对特朗普胜选感到宽慰的这些亚洲人，在很多方面拜登团队的想法是对的。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有可能给亚洲带来相当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于他对现有的美国盟友的轻蔑态度和交易式策略，及微小但正在上升的与中国间的动荡军事冲突风险。对拜登的疑虑没有那么普遍，这一看法也是正确的，亚洲地区的许多人会欢迎更不好斗的美国外交阶段，并且他们会希望新的和解阶段。“中美两国必须达致一种妥协，这种妥协让双方在某些领域成为竞争性关系的同时不让竞争败坏了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写到的那样，这样的前景更可能发生在拜登治下而非特朗普任内。

更重要的是，拜登现在表述了一种比奥巴马当局过往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他在今年早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恶棍”。另一回，他将中国当局描绘为“威权式独裁体制”。与多数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一样，拜登很早就放弃了中国政府能够改革这样的想法，他转而主张美国必须胜过中国这个亚洲对手。拜登也在竞选中向亚洲的听众们释放出了更微妙的信号，不仅包括加强与东盟联系，还暗示他会坚持参加特朗普时常忽略了亚洲地区的会议。Anthony Blinken 是拜登的高级顾问之一，“在应对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这样的重大挑战方面，东盟至关重要”，他最近在推特上写到，“拜登当选总统将在重要议题上保持美国参与其中并且加强与东盟联系”。

然而即使拜登和他的团队推进更鹰派的对华语调，他们面临

困境。这种困境首先与人权相关。拜登将人权议题作为对北京当局的更强硬策略的中心，拜登时常突出新疆数百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苦境。拜登在这个月的一次言词强硬的声明中也关注了西藏问题，“我将要将价值观带回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这对美国的进步人士有吸引力，但是拜登的这种表述给亚洲带去的观感是不太吉利的奥巴马时代之况味，即华盛顿对朋友们说教及逼迫实施民主改革。

接着是第二个问题，优先议题间的相互冲突问题，最明显地体现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拜登近期写到，“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强硬起来”，“最有效的应对中国挑战的方式，是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联合阵线，以对抗中国的暴虐行为及对人权的侵犯，即使我们要在中美利益重合的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寻求合作”。考虑到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惊人地缺乏兴致，这样的冲突并不对特朗普构成困扰。拜登不能指望这样相互冲突的问题自行消失，而是要顶着巨大压力从自己的党内那里争取进展。然而，想要这样做，就需要与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方中国进行接触。对于 Kausikan 这样的拜登批评者而言，正是这种议题再平衡显示了拜登可能回到他们认为奥巴马持有的优先议题含混的立场上去。

归根结底，亚洲国家将适应入主白宫的任一总统候选人。假设拜登当选，他也许能够迅速让他的怀疑者释怀，打消他们对特朗普时代的不可预知之乡愁。但是现在，亚洲地区对拜登的怀疑是真实存在的。拜登的优先任务是赢得美国人的选票。但是考虑

到拜登未来的任何外交政策的中心部分要和亚洲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做得更加让别人确信一些是错不了的。

James Crabtree，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The Billionaire Raj》的作者。

原文刊于：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10/trump-biden-asia-credibility-problem/>

拜登现在是对华鹰派——有限度的鹰派

James Traub 著
吴译凡 不慢 译

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已经准备好了对抗北京——但他不想再来一场冷战。

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死敌，拜登俨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按照他4月份一则广告中的描述，特朗普成了小丑，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向中国妥协，而中国本该为疫情负责的。在他与桑德斯的一对一辩论中，他声称过去40年中共在改善国民福祉方面“微不足道”，而且以一句“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独裁政体”阻断了更深入的探讨。

拜登的说法听起来与国务卿蓬佩奥的言论如出一辙。后者在早前的一次演说中嘲讽（美国的政策）是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范式”，指责中国领导人寻求“中国共产主义的全球霸权”。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说，拜登若当选将联合全球民主政体共同应对不断抬头的威权主义威胁。但他是否会像蓬佩奥那样，预见到与中国的一场新冷战？

实际上，拜登没有。他无非是意识到猛批中国展示了强硬形象又不费成本，甚至在他离任副总统前也并不是这样强硬的。他的好战言论显示了在普遍公众及决策者那里对华政策的共识转变之快。

拜登外事顾问中的中国团队负责人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 曾担任其国安事务助理顾问）在《外交事务》的一系列

文章中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两党一众官员都沉浸在对中国的“幻想”当中。美国让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是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想法，被中国轻蔑地拒绝了。美国在中国身上看到的不只是竞争者，更是对手。

当然，这绝非普遍看法。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就认为，中国的举动与包括当年的美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行为并无二致。美国的决策者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行为无法接受，无非是因为中国比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其他对手们强大得多。然而，拜登及其智囊现在已经抱定“接触已经失败”的思维。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伊利·拉特纳，赞赏特朗普政府 2017《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措辞，这份报告中提到“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的国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挑战，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拜登既想对抗中国，又力求避免新的冷战。他和顾问们认识到，在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跨国事务中，不同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积极接触将难以成事。有鉴于此，他们不认可蓬佩奥冷战意识形态式的谏议，也难认同纳瓦罗(Peter Navarro)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妄想。当然，即便美中在全球经济中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华盛顿也需缩小受制于中国的范围，例如在敏感产品方面以国内供应链取代全球供应链。

拜登的对华政策应该从国内振兴开始的。他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在基建、研发、健康、教育及培训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完全可以胜过中国。但这似乎是另一种美好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在放缓，但仍是美国的 3 倍。过去几年，中国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再过数年，可能不管按何种标准统计，中国都将是最大的经济体。

当然，这种衡量办法可能是错的。在一个按规则行事的世界里，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才决定谁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许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 2017 年的著作《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所说，实力的优势可能会转移到中国一方。但对于那些坚信二战后主要由华盛顿塑造了“自由世界秩序”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难于忍受的结论。这样的秩序建基于结盟之上，西方的民主国家是其核心，正是这样的机制和网络构成了对中国的牵制。朱利安尼·史密斯

（Julianne Smith 在拉特纳 之前是拜登的国安助理顾问）与托列伊·陶西格（Torey Taussig）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德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信任中国胜于信任美国，但中国渗入这些国家经济的网络间谍行为、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压制及在香港的打压，让这些国家深感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习近平来访的场合中，还宣称欧洲要终结对中国的“幼稚病”。

与美国一样，欧洲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大规模的政府支持出口产业，操纵汇率，以及要求获得境外投资者的技术机密。这些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称为“地缘经济”议题。但当特朗普就任后开始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时，他攻击欧洲国家的言辞更为尖刻，而不是与欧洲一道将议题正常化。

这就是被浪费掉的机会——假设特朗普真正在乎这种机会的话。对于除特朗普的任何美国总统而言，明摆着的是西方民主

国家的凝聚力不只是地缘经济的利益，更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那些受到中国威胁的价值观。拜登急于加入这样的角逐，他会在得到重振的自由秩序的框架内做这样的尝试。他呼吁“自由世界”联合起来与推行高科技威权主义的中国进行竞争。

讨论同中国的关系几乎将是拜登计划召集的“民主国家峰会”最重要的议程。这既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能展现民主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团结姿态。正如朱利安尼·史密斯提到：“澳大利亚并没有因为宣布拒绝华为公司——中国 5G 领域的巨头——而遭受严重的后果”，“而日本同中国打交道的历史十分悠久。”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国家也有威望力谴责中国对香港、新疆以及内陆地区的镇压活动——尽管他们在改变这些行为方面能做的事有限。

拜登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会赢得党内左派的支持，甚至在贸易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过，他可能通过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地区的扩张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是太平洋国家。美国将需要提升先进的雷达技术以及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杰弗里·普里斯科特（Jeffrey Prescott）提到，他是拜登外围外交政策顾问中比较核心的四五个人之一（朱利安尼·史密斯也是）。他说，拜登不会回避对抗。当中国企图在国际水域阻止美国飞机飞跃其自称的防空识别区时，拜登径直告诉习近平：“我们将直接飞跃那里。”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新增防空识别区了。

俄罗斯作为另一个巨大的专制主义的敌人，几乎引发不了前

述的两难问题。“有望同俄罗斯进行合作的事项非常少。”米歇尔·卡本特（Michael Carpenter）。卡本特是拜登的另一名前国家安全助理，如今在拜登决策层的最核心位置。他说，“只剩下缓解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的影响、抗击传染病、降低两军冲突风险以及军备控制这几条了。”同 2009 年奥巴马政府设想的“重置”美俄关系的计划相比，这份（合作）清单要短得多。而剩下的都是需要对抗的事项。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以及占领克里米亚，他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东欧邻国的威胁姿态，而 2016 年其对美国总统大选进行网络攻击更是让俄罗斯彻底成为美国的敌人，这还是“柏林墙”倒塌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状况。

尽管俄罗斯国力快速衰落，但由于普京坚信西方民主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这让俄罗斯比中国更危险，至少短期看是如此。拜登和卡本特 2018 年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俄罗斯已经将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最著名的案例，当然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接近普京的寡头们给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及特朗普其他的至交好友送了大把钞票，用于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并接近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层。而特朗普则对他们赞赏有加。

在这些事情，正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遭受的威胁以及必要的应对措施模糊了内政和外交的区别。拜登将会——谁不会呢？——一起诉国内那些向敌人出卖美国利益的人。除此之外，Carpenter 说，拜登还会“使用司法和情报手段，将俄罗斯在美

国制造邪恶影响力的网络连根拔起。他将加强网络防御能力以及选举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法律禁止匿名的空壳公司，提高地产业实际所有权的透明度，并和北约盟友们一起增强军事威慑和防御能力。” 拜登将向普京发出明确的警告。“成本收益的计算将会改变。” 卡本特说。以乌克兰事件为例，可能会增加制裁措施，并加大对乌克兰政府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武器。

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如此缺乏连贯性，而他的对俄政策如此“叛国”——几乎难以避免使用该词，任何其他选项都将比他的选择更好。而拜登的计划是同时与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抗，即便是要非常慎重地采取行动，并且有其他民主国家盟友相助，仍存切实风险的边缘政策会将各方带向危险边缘。在真实的冷战中，双方都稳稳控制住事情的走向——虽然有时仅仅是勉强维持——以避免直接冲突。回过头看，这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拜登如果就任总统，将需要在审慎和果敢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James Traub 是《外交政策》杂志的定期撰稿人和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What Was Liberalism? The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of A Noble Idea》一书的作者。

原文刊于：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9/03/biden-is-now-a-china-hawk-with-limits/>